

DANGDAI ZHONGGUO  
ZHENGDANG ZHIDU  
YANJIU

# 当代中国 政党制度研究

杨爱珍 著



学林出版社

DANGDAI ZHONGGUO  
ZHENGDANG ZHIDU YANJIU

# 当代中国 政党制度研究

杨爱珍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杨爱珍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68-722-X

I. 当... II. 杨... III. 政党-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 IV.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793 号

##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作 者——杨爱珍

特约编辑——陈 功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吉 丰

责任监制——叶 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 万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722-X/D·32

定 价—— 18.00 元

# 目 录

<b>第一章 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历史考察</b>	.....	1
一、传统政治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1
(一) 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和表现特征	.....	1
(二) 封建政治传统下关于“党”的诠释	.....	5
二、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现代政党的萌动	.....	8
(一) 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	8
(二) 现代政党的萌动和第一次组党高潮	.....	17
<b>第二章 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安排</b>	.....	23
一、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悲剧性实验	.....	23
(一) 民初党人的政治实践	.....	23
(二) 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流产	.....	30
(三) 竞争型政党制度流产的原因	.....	33
二、孙中山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	.....	37
(一)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	.....	38
(二) 国共合作体制的形成和解体	.....	41

## 2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三、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的失败	43
(一) 一党独裁制度的基本特征	43
(二) 一党独裁制度的破产	48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探索

一、宪政运动中的政党合作	52
(一) 在中国国情中产生的民主党派	53
(二) 中共和民主党派共同推动民主潮流	59
二、“三三制”政权孕育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萌芽	67
(一) “三三制”政权开拓政党制度新视角	68
(二) “三三制”政权折射现代政治文明	71
三、中国特色政党合作格局形成	75
(一) 民主党派组织格局确立	76
(二) 在人民民主运动中寻找新的路标	82
(三)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84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期发展和遭遇曲折

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初期发展	90
(一) 新政协的召开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90
(二) “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期发展	96
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108
(一) 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对我国政党制度的	

---

## 目 录 3

影响 .....	108
(二) 十年动乱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严重破坏 .....	118
<b>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b>	<b>128</b>
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新时期的发展 .....	128
(一)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恢复中探索前进 .....	128
(二)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发展 .....	134
二、发展面向 21 世纪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 .....	148
(一)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安排的法制化进程 .....	148
(二)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建设上了新平台 .....	156
(三) 当代中国政党之间的合作日趋规范化 .....	162
<b>第六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分析 .....</b>	<b>174</b>
一、当代中国政党的运行机制 .....	174
(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调适和创新 .....	174
(二) 各民主党派运行机制的研究 .....	195
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行机制 .....	212
(一)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行的基本内容 .....	212
(二) 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重点分析 .....	229
<b>第七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理论思考 .....</b>	<b>235</b>
一、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 .....	235

4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
(一) 从历史高度认识四条标准的现实意义	236
(二) 对衡量我国政党制度四条标准的解读	241
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发展我国特色政党制度	258
(一) 历史和现实交给我们的一项课题	259
(二) 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几点思考	261
<b>第八章 在变动的世界中审视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关系</b>	<b>271</b>
一、世界潮流与政党的变革	271
(一) 西方政党体系中善于革新的典范	271
(二) 政党的衰落与政党制度的变化	277
二、苏东政党制度模式的失败与东欧社会主义进程的中断	283
(一) 苏联共产党的过度集权领导与一党制弊端的关系	284
(二) 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和挫折	293
<b>参考书目</b>	<b>304</b>
<b>后记</b>	<b>307</b>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历史考察

政治发展的坐标轴表明,政党是政党制度的源点。因此,考量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首先要分析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回眸历史,中国进入了20世纪的门槛后,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政党才诞生在社会摇篮之中。放眼世界,西方国家的政党脱胎于议会、活跃在议会,已有了二百多年成长历史。西方的政治家把敞着口的民主原则逐步制度化,政党活动日趋理性。究其中国很迟才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孕育和发展的传统政治文明,阻碍政党的萌动。20世纪初,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和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传统政治文明才开始转型,这一转型为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政治土壤。

## 一、传统政治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铸就了带有“治水社会”印记的传统政治文明。传统政治文明绵长悠远,其文明理念和价值精神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 (一) 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和表现特征

在世界史的视野中,中国属于典型“亚细亚社会”的范畴。马

克思对“亚细亚社会”有过深刻的剖析，认为亚细亚社会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单独的、不变的社会形态。美国学者魏特夫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从地理—历史的角度提出了“治水社会”的概念。他认为：“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党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遍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sup>①</sup> 魏特夫对中国所具有的“治水社会形态”的解析，使我们对传统政治文明生长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 1. 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人们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传统农业生产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家—户的封建小农经济。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自然经济单位是家庭（西方古代自然经济单位是庄园），实行的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家庭就作为载体把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结合起来”<sup>②</sup>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这种生产结构延伸到社会，成为社会框架结构的基本模式，也是传统政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二是“治水农业”需要政府集中力量来从事水利工程，容易导致集权国家的产生。美国学者里格斯提出了融合型、衍射型、棱柱型的行政模式。融合型的特征是，经济水平是农业生产力；政治与行政不分；权力来源于君主；社会不成熟。古代中国长

<sup>①</sup> 参见[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sup>②</sup>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期处在融合型的行政模式之中。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着发育十分成熟的官僚体系，但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少公民社会来过渡民意。集权统治和社会的不成熟是传统政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从传统农业特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把握由此产生的某些政治文化的特质。这些特质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集权主义根深蒂固，穿越时空，至今仍有生命力；血缘宗法制度成为一种神圣的准政治体制缠绕在社会的肌体上，家长制泛化成一种观念，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 2. 传统政治文明的表现特征

在我国“农业一宗法”的历史土壤中孕育生成的传统政治文明，其价值精神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我们梳理其中与政党和政党制度有关的部分来加以分析。

第一，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泛道德化倾向，尤其是在道德范畴中对政治道德的“廉洁奉公”有深刻的内涵规范。“廉洁”一词最初出现在战国时代屈原的《招魂》篇“朕幼清以廉洁兮”中，后人王逸注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奉公”一词出现在西汉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以君之类，奉公守法，则上下本”。中国的“治水社会”的特点决定了社会对官吏的廉洁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在这类地区，人们面对干旱和半干旱的环境，要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需要修筑灌溉工程才能发展农业。而这种大规模的协作只有在有威信的管理者领导下才能达到号令群众，步调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推动治水社会发展的枢纽是良好的道德，尤其是官吏的道德行为。社会要求官吏内省与慎独，以达到“修、齐、治、平”，“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是以德治国，自律是德治的核心，一切政治的运作均始于个体内省式的道德自律。18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其著作中曾经指出：中国和欧洲是两个最伟大的文明中心，欧洲文化的特点主要是科

学,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道德哲学。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之一的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有把道德和政治管理结合起来的传统,这种传统是流淌在中国文明长河中的主流。

第二,传统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中庸、和谐、合作”的价值精神绵延几千年,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社会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中庸”的含义是在过与不及之间选择一个中道,寻求在当时当地条件下最适合的“中”。“和谐”主张以和为贵,强调在一个共同体中,要宽容大度,求同存异,取人之长,容人之短,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事物能够相协调而发展,追求多样性中的一致性。“君子和而不同”及“协和万邦”等整体和谐理念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治理国家的方式体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和谐的境界。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以伦理为出发点,“和谐”是基本,每一个体均视“情义”为尺度,在人们的心理中自然生成了“义务本位”观念,尊重他人,内敛个体要求,“重合作”则是“中庸、和谐”的落脚点。重视合作,就是把个体价值归结为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第三,民本思想是传统政治文明关于价值关怀的基础。在我国传统的话语中,“主权”意味着君王的统治权,君王权力的政治基础是“受命于天”。但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统治者十分清楚民意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载舟覆舟”的关系。在《礼记·缁衣》中就有“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阐述。《尚书·五子之歌》更有论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条影响绵长久远的主线,然而,民本思想在我国政治实践中只能从经济上富民、恤民、养民;从政治角度也只限于“选贤举能”来惠民,只是“为民作主”,而不是古希腊开创的对权力进行规

范和监督的“让人民作主”的民主制度。

第四,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首先是一个等级社会。这是传统政治文明制度特色的体现。所谓等级,是指按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划分并被法律确认的不同社会集团。在古代中国,等级的划分,早期主要从血缘着眼,后来与官僚制度相结合,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一套宗法等级制度。社会结构体系以个人的身份等级为基础,呈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特征。这种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直到清代,社会结构仍然分成六个等级:即皇帝、宗室贵族、官僚阶层、绅士阶层、平民阶层和贱民阶层。<sup>①</sup> 古代中国的等级制度影响之深在全世界罕见,而在等级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以传统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等级观念告诉人们:“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因此,每个人应该按其所归属的等级行事,各按其位,各尽其职,“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映在法律关系上,就有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规范。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下,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运作过程和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传统等级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和性质。而今,传统等级制度已经不存在,但是,以传统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依旧有生命力,并把一些现代的东西加以异化,使其成为等级观念残余的新的依赖物,而新的依赖物又强化了等级观念的残余。“集权型”的政治管理、“官本位”意识盘根错节、“清官文化”的泛滥等等,都是传统等级观念在今天的顽强反映。

## (二) 封建政治传统下关于“党”的诠释

对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表现特征的描述,可以看出传统

<sup>①</sup>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41 页。

政治文明有着反政党的倾向。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了解古代中国对“党”的诠释。我国古代对“党”的概念中塞入了封建的东西，因此，中国进入近代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对政党的误读。

在中国古代，指称集团的“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常与“朋”合用，特指互相勾结、谋私或谋反的小集团。而朋、党与朋党本来是全不相干的概念。

朋，原是货币单位。上古时期以贝壳为货币，大体上是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sup>①</sup>由于“朋”原本具有聚集、串联之意，后来就引申出“群”“类”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朋”又异化为“同门”、“同道”之说。

党，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字中很早出现，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党”最初是指周代乡以下的基层单位，如《周礼·官记·大司徒》所云：“五族为党。”后来在党的含义中又引申出“党附”的意思，意为人们应该用宗族血缘关系来维持“党”的共同利益。“朋”和“党”两个字在演变过程中，字义逐渐接近，都带有朋比、党附的含义，所以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就合成为“朋党”一词，并赋有专门的含义驻足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朋党大都持批判态度。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认为君子能合群，但不能结党。《尚书》指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认为没有党的世道，天下就平安。朋党本来是指为了营私而结合者，以后就推衍为不管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只要结合在一起形成团体，便是朋党。

朋党出现在政治舞台后，人们就不断对它口诛笔伐。但是在

<sup>①</sup> 转引自朱子彦、陈生民：《朋党政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每个朝代，朋党之争却越演越烈，因为朋党与封建专制有不解之缘。朋党是封建专制政体的派生物，植根在封建社会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土壤之中。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体制决定了其统治集团内部君臣之间、官僚之间始终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官场险恶，使每个入仕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在追求升官晋爵的同时，组成派别，互相攀援，殉情庇护。因此，朋党还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党派之间都是采用党同伐异的手段，对异己者一概打击排斥。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党集团，如阉党、官僚士大夫朋党、戚党、后党、帝党、逆党、新党、旧党等<sup>①</sup>。历史上的朋党之争，使得官场更加腐败。当然，在北宋时期，欧阳修曾写过《朋党论》，试图为“党”正名，消除对朋党的片面的理解。他把“党”分成“小人之党”和“君子之党”。欧阳修认为，“君子之党”是真正的“党”，因为他们是基于“道义的结合”，因此，要“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明朝东林党也许是属于“君子之党”，东林党中有一部分较正直、较有抱负的士大夫，他们“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反对阉党的擅权。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个发展趋势看，党争的结果总是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朋党的围剿，也由于朋党之争对社会的破坏导致民众对朋党的痛恨，20世纪前的中国社会视“党”为洪水猛兽，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恪守“君子群而不党”的原则而不敢逾越，一方面害怕因结党而带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也怕背上“党”的名声，使个人道德蒙羞。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西方的“党”的概念传入中国，这个“党”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党”是有重要区别的，不是具有同样意义的概

---

<sup>①</sup> 朱子彦、陈生民：《朋党政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念。但是当近代人采用了日本的汉字翻译法，将 political party 用“党”字来指称，认为西方“党”的含义中与古代中国“党”在“团体”这一层面上有相同之处。然而，“这一吻合，曾让许多近代中国人心悸，造成了近代对‘党’的偏见和传播障碍”<sup>①</sup>。

近代中国人要突破这一政治传统的藩篱，有待社会的变迁及思想解放运动。

## 二、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现代政党的萌动

西方政治学说的东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向近代转型并构成中国政党萌动的重要条件。

### （一）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按照现代化理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大致可以分成“自生型”和“回应型”（又称外生型）两大类型。前者是一国内部现代化因素自我成长的结果，而后一种则是对世界范围内前现代化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扩张的一种反应。19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如英、美等国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其现代化模式被称为早发内生型。在这类国家中，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则是在外部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甚至在其直接的压力下促动的，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不仅是在起点低、起动迟的情况下发动的，而且是在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勉强作出的回应。因此，在中国，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

<sup>①</sup> 金安平：《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 页。

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而是在外在压力下的产物,这就注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政党自产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17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同旧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产生了分别作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前身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当然,这只是现代政党的前身。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政党才在欧美国家比较普遍出现,而传到中国,则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现代政党的理念姗姗来迟,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内部还不具备接受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

### 1. 近代政党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是近代政党形成的经济和阶级条件。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为西方政党学说的传播和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条件。1840年,西方列强以血和火的严酷方式,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以使用机器和动力为标志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内部缓慢形成,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了初步发展。尽管其发展的历程十分艰难,而且走的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在民族资本方面,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波浪式,趋势是向上的,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当时,设厂数和资本额都有较大的增加。从1895年~1913年的近二十年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商办厂矿共有463家。<sup>①</sup> 而从1872年~1894年的22年间,不论资本的多少,

---

<sup>①</sup> 转引自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所设立的商办厂矿总共 53 家,资本总额才 460 多万元。<sup>①</sup>当然,民间资本的力量十分薄弱,构成当时中国工业主体的是洋务派兴办的企业。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直接催生了资产阶级,也使无产阶级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两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社会裂变注入原动力。当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成熟。在社会改革中,“中国企业家不可能运用与日本相同前提条件,因为中国没有能与 19 世纪后半期勃起的许多日本实业家真正匹敌的精英。”<sup>②</sup>但是,从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条件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部分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社会基础,海外华侨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促成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1840 年以前,中国的教育资源完全被国家权力体系所垄断,控制社会的只有官学形态的儒学和由此产生的科举功名。随着国门的打开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一种来自西方的新的文化资源登陆中国,导致了大量新式学校的产生,新式学校的产生使新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有了生长的空间。新式学校的产生和留学生的出现,是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知识分子由传统转向现代的界标。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是传递新思想、新观念的开路先锋。

第二,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央权威的衰落是近代政党形成的

<sup>①</sup> 转引自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 页。

<sup>②</sup>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 页。